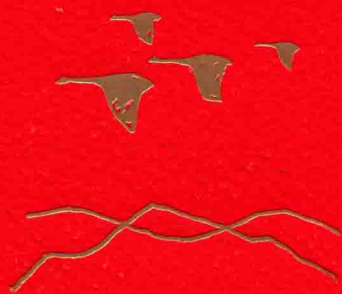


袁培树 陈昕 著



消费经济学批判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消费经济学批判

袁培树 陈昕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费经济学批判/袁培树,陈昕著. —上海: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432-2862-7

I. ①消… II. ①袁… ②陈… III. ①消费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6374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封面设计 胡 斌 刘健敏

消费经济学批判

袁培树 陈昕 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7

字 数 292,000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862-7/F·1109

定 价 88.00 元

消费经济学批判



袁培树（右）与陈昕（左），摄于1988年

袁培树 1951年12月生于武汉市。经济学人，教授。曾在湘潭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曾兼任湖南省青年经济学家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经济学会理事、《管理世界》杂志编委、《消费经济》杂志编委。先后在《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著有或与他人合著有10多部学术专著，其中参与撰写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一书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陈 昕 1952年6月生于大连市。出版人，编审。曾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等职。曾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上海社联副主席。先后在《经济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近200篇，出版有各类著作15部。

再版前记

本书初版于1988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并列入“青年学者丛书”。承蒙格致出版社厚爱,三十年后本书得以再版重印。

这篇再版前记本应由本书的第一作者袁培树教授撰写,但我们自2000年起便失去联系,本书再版付印前仍未联系上他,所以只能由我越俎代庖,写下如下一些文字,介绍本书出版的来龙去脉。

消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研究的是消费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消费作为一种社会性过程行为,内在地统一着这样两个方面,即消费过程的经济内容和消费过程的社会形式。前者主要涉及消费力的合理组织问题,后者则可抽象为消费关系问题。在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揭示消费过程的运动规律性,是消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价值与逻辑活力所在。

在我国,如此重要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于改革开放之前却长期未能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以至被排除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之外,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使国民经济陷入了“重生产、轻消费”的泥潭;二是当年短缺经济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可能纳入以需求拉动供给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模式,消费问题自然处于生产的从属地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经济体制模式 and 经济发展战略的全面转换,把经济学家的视野重新拉回到消费经济问题上,并

急切地呼唤着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的勃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进入消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出版了一批消费经济学的理论著作和教材,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由湘潭大学教授尹世杰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一书。该书于1984年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该书由湘潭大学经济系和消费经济研究所的10多位经济学者合作完成。袁培树同志当时是湘潭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参与了这部著作的编写。从1981年到1988年,他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0多篇经济学论文,与他人合作出版了5部著作,是我国消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我与消费经济学结缘始于1981年。那一年学林出版社成立,最早策划的一套丛书是“学习之友丛书”。这套丛书包括政治、法律、历史、文艺、国际知识、经济管理、科学技术等各个门类,旨在介绍当时世界最新的,同时又是做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的基础知识。最初的出版计划中有一本《通俗政治经济学》的选题,由著名出版家、经济学家巢峰同志担任主编。因为此前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经济学文章,引起了巢峰同志的关注,他邀请我参加这本读物的编写工作。参加编写的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林克勤、欧阳仲华和魏允和三人。这本《通俗政治经济学》的编写不同于以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按照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来设计全书的框架和体系的。我负责消费部分的写作。正如前述,消费当时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是被忽略的部分,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作参考,当我感到为难的时候,巢峰同志鼓励我克服困难,从头研究,说这是以往经济学研究的禁区,因而也容易出新的成果。在巢峰同志的指导下,我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关于消费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生产

与消费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消费的性质、消费与生产的相互作用、消费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在学习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四五万字，完成了该书消费部分的写作。由于各种原因，这部通俗政治经济学读物后来并没有出版，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件憾事，但由此却开始了消费经济学的研究。

1984年，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策划了一套“经济知识丛书”，由人民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联合出版。作为学林出版社唯一的经济学编辑，我自然负责起这套丛书中由学林出版社承担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些书中有一本《消费经济》的读物，由湘潭大学罗正齐、袁培树合著，我因此结识了袁培树同志。1986年2月，《消费经济》出版后袁培树同志来到上海，我们一起畅谈了对国内消费经济学研究的看法，有不少共鸣之处。当袁培树同志知悉我也从事过一段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后，力邀我与他一起合写一部消费经济学著作，于是就有了后来出版的《消费经济学批判》一书。

说实在话，当年我对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仅限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远没有深入到消费过程内部诸要素、诸环节在市场经济环流中的有效配置等问题，更谈不上研究具体的微观消费与宏观消费问题。而袁培树同志此时则已经对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有了系统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范畴和观点，希望建构一种反传统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消费体制模式的全面转换、消费政策的全面改革提供一种带战略导向性的理论依据。鉴于此，我主张还是由他独立完成此部著作，我可以担任责任编辑。但是袁培树同志执意要我参加著述。盛情难却，我只

得将参加编写《通俗政治经济学》时写下的关于消费的那四五万文字交于袁培树同志,这些文字的大部分构成了书中对消费在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内在联系中的功能和地位所作分析的内容。其实,这部分内容袁培树同志是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对此,我内心对袁培树同志一直存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部三十年前出版的旧作,今天回过头来看,无论在理论体系、分析框架方面,还是在理论阐述、实证分析方面,抑或在改革发展、政策建议方面大都还站得住,这三十年我国在消费领域的改革进程和举措与书中的描述、推测和建议总体上也是一致的,这是一部理论著作的生命力所在。当然,我们都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限于时间和条件,书中也有一些观点和推断或过时了,或有所偏颇,这也是需要提及的。本次再版,我对全书除作了个别文字上的订正外,未作其他任何改动,为的是保存当年研究成果的原貌,反映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对消费经济学研究的真实水平。

最后,感谢格致出版社社长范蔚文、副总编辑忻雁翔为本书再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陈 昕

2018年5月8日

前 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和开放的时代。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选择。

我国的经济科学正经受着改革实践的批判。

与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革相伴随的,必然是经济理论的深刻裂变;而改革行为的力度又往往来自理论反思的深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庞大的经济理论体系及其分支学科,都必须在改革的理性“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我们为消费经济学辩护。我们的辩护从下述一连串“为什么”开始。

传统理论经济学的一般规范认为:资本主义以对剩余价值无休止的渴求为直接目的,消费问题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直接目的,消费需求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出发点。既然如此:

为什么有关消费经济的学科性研究最早发轫于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消费经济学能够积累和发展起日益丰富的实证知识体系?

为什么消费经济学在我国长期未能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以至被排除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之外?

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消费经济学在我国能够迅速起步,并引起经济理论界的瞩目?

为什么？为什么？……

正是对这一连串“为什么”的深沉反思，孕育着我们建立消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新思路。

对消费经济学在我国姗姗来迟的原因，最表象的回答可以归结为我们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指导思想的失误——或许是处理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经验不足，或许是受“重生产、轻消费”的“左”的指导思想干扰，或许是人为的原因使然。与此相应，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消费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崛起的动因，则可以直接归结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和政策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或许是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调整，或许是对“重生产、轻消费”的“左”的指导思想的批判，或许是政府行为的有序化。这种回答当然包含着真理的颗粒；但是，上述问题毕竟还蕴涵着深刻的结构性经济机理。

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极度短缺的基础上起步的。在短缺的条件下，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衡量标准及其机制选择，不可能纳入以需求拉动供给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模式。而高度集中的、以供给决定需求为基本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却恰恰具有高度动员资源的能力。在这样一种经济“场”中，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规范过于理想化的人们，很自然地会对消费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而满怀高尚的义愤。然而，感情上的义愤在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面前是那样苍白无力！在解决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时，尽管感情上可以拒绝消费对生产的从属地位，但在经济行为中却不得不默默地消化这种酸果。“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我们认为，只有从经济短缺这个历史背景来反思消费经济学在我国长期沉默的原因，才能使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具有深沉的历史感。

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建设，我国社会生产力毕竟在付出高昂代价的

曲折历程中顽强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毕竟在逐步增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措施,对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发挥着巨大的效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冲击,为全面转换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在经济极度短缺状态迅速缓解的基础上,转向以需求拉动供给的经济发展战略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由于商品经济与市场需求的天然联系,选择商品经济模式,必然把消费需求推上经济发展主动因的地位。经济体制模式 and 经济发展战略的全面转换,急切地呼唤着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的勃兴;而经济体制模式 and 经济发展战略的全面转换,又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决策所启动的。因此,只有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全面转换这一历史高度,来把握消费经济学在近年内迅速勃兴的原因,才能使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具有急迫的现实感。

正是在深沉的历史回顾和急迫的现实审视的交汇点上,我们提炼出了自己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把产品供给制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的全面转换作为立论的历史背景,在商品经济型消费力与消费关系的质量对应运动中,以揭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过程的运动规律性为逻辑枢纽,来构筑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设计消费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逻辑枢纽的选择问题上,我们试图超越国内目前的消费经济学研究水平。

国内现有的几部消费经济学著作,一般都是从消费需要出发,以满足消费者需要作为贯穿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线索的。在消费者需要之后,再依次排列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市场、消费方式、消费效益、消费模式等等。对消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这样一种处理,很显然没有注意到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过程展开的客观逻辑。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抽象的消费者需要是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总体循环中的一个现实要素的。只有通

过市场表现出来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经济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的一个基本参数。同时,在消费品市场运动过程(包括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机制的流程)没有得到实证性描述之时,就来论述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等具体范畴,这不仅堵塞了探索这些范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特定经济社会内涵的通路,从而使这些范畴变成政治经济学术语的简单移植;而且会从根本上放弃对消费现象和消费过程的运行机制和结构动态作实证性的描述。这些问题是目前国内几本消费经济学著作在理论体系设计上的通病,也是本书在设计逻辑体系时所选择的突破口。

本书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逻辑为基础,以消费过程内部诸要素、诸环节在商品经济环流中的有效配置程序为坐标,来展开其逻辑体系:

第一章“消费关系系统分析”,是消费者主体行为研究的始点。在这一章,我们分析的重点不是消费者“应该怎样”、“必须如何”,我们也不急于用某些没有经过论证的规范来判断消费者行为是否“合理”,而把重点转向分析在既定的消费关系中,消费者行为“实际上如何”、“只可能如何”。这样,就把判断消费者行为是否“合理”的理论兴趣,转向描述消费者行为的动态程序,以把握促成消费者行为格局的利益机制。第二章“消费力论”是对消费者行为的结构性动态考察。如果对消费者行为作横截面上的静态分析,可以描述出消费力的静态结构;如果把消费者行为看作一种不断的行为“流”,并对这种行为“流”作流程性动态考察,就必然提出对消费力的系统调控问题。本书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综合层次上,对消费力与消费关系的质量双重对应运动作系统的描述,从而得出消费者行为在主体性动机和客体性约束二者统一中的具体图像。

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消费在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内在联系中的功能和地位,作大跨度的历史分析。第三章主要分析消费在社会再生产四个

环节中的一般功能;第四章则着重描述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中,消费的功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第五章对消费者需要进行较为详尽的研究:作为消费关系人格化的消费者,其行为流程的激活,消费者需要的触发是一个重要契机;消费者行为流程的程序推移,则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需要的结构性分布;消费者需要的结构性变动,消费者行为指向的变异,及其对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导向目标选择,在商品经济运行系统中,其间起决定作用的调节机制是消费者需求饱和律。

第六章“消费品市场组合论”是本书在逻辑结构上对其他消费经济学专著进行全面性批判的重要一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尚未得到充分说明,就来谈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等问题,所得到的只能是消费水平幻觉、消费结构畸变、消费方式“教条”而已。有鉴于此,本书在“消费者需要研究”一章后,紧接着对消费品市场组合进行理论分析。这种逻辑处理的客观依据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行为流程的内在程序。

第七章“消费规模经济考察”和第八章“消费时间分析”,是本书对消费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正如空间和时间是任何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一样,消费过程的展开和消费者行为的流程,同样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上予以多维的描述。诸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等现象,倘若没有消费空间上的“定位”和消费时间上的“定格”,那就始终是一团混沌的表象;而如果要对这些消费现象作出哪怕仅是含有真理颗粒的数量分析,却没有意识到使任何数量具有意义的空间限制和时间约束,那么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数量分析就不过是数学游戏而已。因此,本书在论述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之前,先研究消费规模和消费时间。研究消费的空间形式问题,必然要探讨消费规模经济和消费规模不经济之间的反差,以及消费规

模选择与消费效益之间的函数关系。而对消费时间分析的理论尝试,则导出了消费品更新周期、消费者行为流程周期与国民经济总体循环沿时间轴的速度分布、节奏调适和同步关系等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尚未引起注意的重大课题。

一反其他消费经济学著作的逻辑处理系统,在讨论消费水平问题之前,本书第九章和第十章专门讨论消费结构问题。第九章从批判消费结构研究的传统思维入手,以消费者需求的梯度层次与消费结构的宏观类型层次之间的质量双重对应关系为逻辑线索,试图解决宏观消费结构的层次升迁与小康水平诸阶段结构图像的连续逼近之间的相关联系。第十章具体分析消费结构的经济效率,及其对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结构选择的乘数效应差异。这在逻辑进程上,则表现为由消费者行为的内在流程向国民经济总体循环流程的上升。

消费水平作为一个多变量、多侧面、多维的综合层次极高的范畴,在消费过程的诸要素、诸环节,乃至国民经济总体格局得到充分说明之前,要想把握其丰富的经济社会涵义及其结构质态,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到第十一章才来论述消费水平问题。

第十二章“消费体制模式改革探索”,是本书逻辑延续的终端,也是本书的一个大胆尝试。这一章中关于消费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设计、消费体制模式改革的程序选择、消费品市场体系一元化等的探讨,都是国内经济理论界所没有做过的。

行文至此,我们不胜惶恐!

我们惶恐:不仅因为本书的逻辑结构是建立在对其他消费经济学著作批判基础上的,同时还因为本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是对其他消费经济学著作的全面挑战。本书不仅旨在建构一种反传统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试图为消费体制模式的全面转换、消费政策的全面

改革提供一种带战略导向性的理论依据。因此,本书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逼近现实的实证性描述,更多地注重政策性研究。

我们惶恐:不仅因为本书对其他消费经济学专著中使用的几乎所有主要范畴进行了全面的扬弃,而且还因为本书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新的范畴,例如内涵性消费增长、消费者行为时序选择的“时间贴水”、效率消费需要、需求饱和律、需求积累、消费本位、消费规模效益、消费结构的经济效率等等。这些全新范畴的界定,最终将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我们惶恐,因为我们是在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但结果呢?是赞扬,是贬斥,抑或是沉默?是一次成功的探索,还是一次失败的记录?不管如何,成功者给人们显示的是肯定意义的贡献,而失败者给人们显示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否定意义的贡献呢!

我们的惶恐,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惶恐。我们不敢奢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但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欢呼顶点的光辉。